·高等教育史·

中国近代大学理念的转型

——从《大学堂章程》到《大学令》

周谷平[1]，张 雁[2]
（1.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2.浙江大学 城市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摘 要：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虽有大学之形却缺大学之实。所谓的"形"是指京师大学堂从日本间接移植了现代大学相关制度、导入相关教学内容，而其"实"，却依然受传统理念的影响，没有摆脱旧式官僚养成所的实质。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1904年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均体现了这一点。直到民国初年蔡元培主持制订的《大学令》，才标志着中国近代大学理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开始。

关键词：大学理念；转型；蔡元培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7)10-0097-07

The transition of the idea of modern university in China

—From Jingshi Daxuetang Zhangcheng to Daxue Ling

ZHOU Gu-ping[1], ZHANG Yan[2]
(1. *School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2. *City Colleg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5, *China*)

Abstract: The Jingshi Daxuetang established in 1898 displayed the form but not the reality of a university. The so called "form"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it borrowed relevant system of a modern university and introduced relevant instruction contents from Japan indirectly. While, "reality" so called was stil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ideas, not free from the old-fashioned bureau nature. The phenomenon mentioned above can be reflected in Qinding Jingshi Daxuetang Zhangcheng(regulations of Peking University made in 1902) and Jingshi Daxuetang zhangcheng made in 1904. Not until the appearance of Daxue Ling chiefly made by Cai yuanpei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an the university idea of modern university see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Key words: university idea; transition; Cai yuanpei

19世纪中后期，中国不断面对挨打的被动局面，尤其是甲午一役的惨败，让国人处于痛定思痛的

收稿日期：2007-08-02
作者简介：周谷平(1957—)，女，浙江鄞县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张 雁(1970—)，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外高等教育史研究。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反思中。“蕞尔小国“将战胜“泱泱大国”的原因归结为教育，中国朝野上下亦把症结归为教育，于是教育—人才—救国之间的逻辑联系就此连接在一起。“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的看法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认同。改革传统教育逐渐成为共识。远法德国，近采日本，大力兴办新式教育，在全国成为一股热潮。

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政府试图导入西方大学的尝试，也表明开明人士逐渐认识到大学教育在国家强盛中的作用。可它虽有大学之形却缺大学之实。所谓的“形“是指京师大学堂从日本间接移植了现代大学相关制度、导入相关教学内容，而“实“却依然受传统理念的影响，没有摆脱旧式官僚养成所的实质。直至民国初年蔡元培主持制订的《大学令》才标志着中国近代大学理念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真正开始。

本文拟从为京师大学堂开设而专门制订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大学堂章程》及民国初年制订的《大学令》入手，通过分析这三份大学规章制度的特点及相关办学实践，考察中国近代大学理念在历经清末到民国初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大学办学模式从效法日本向效法德国的转型，及蔡元培在此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一、中体西用的杂糅：《大学堂章程》及其办学理念

对日本教育体系的全面考察始于甲午战后。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日本国情与中国最为接近，西学中一些与东方文化不合甚至荒谬之处，很多已经由日人做了选择和修改，通过日本这个中介学习西方可以百利而无一害。在此思想指导下，清政府派员详细考察了日本整个学制系统，根据“将大学、中学、小学一切规制课程并考试之法逐条详查”的要求，游历人员均撰写了考察报告。其中以罗振玉《扶桑两月记》、吴汝纶《东游丛录》最为著名。

《扶桑两月记》详细描述了日本大学法、医、工、文、理、农六科专业设置，及相关的教科书、学费、考试体系、学位等教学管理制度。《东游丛录》则详录了日本的小学、中学、高等学堂、大学学制系统，包括各级教学体系中课程安排、修业年限、教材及大学的专业分科。特别是关于日本帝国大学的介绍最为详尽，不仅列出了各专业各学年所教授的科目、每门课程的学时、还涉及到学生的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

这些详细的考察报告为清政府制订京师大学堂章程提供了参照样本。1902年由当时的管学大臣张百熙负责制定了《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但该章程并没有实施。此后张之洞、荣庆奉旨会同张百熙对《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进行修订，于1904年出台了《奏定大学堂章程》。后者经清廷同意，正式公布并执行。

对比这两份章程中课程、学时、专业设置等相关内容，都能发现日本大学教育体系的浓重痕迹。下面我们试分析两份章程的特点及其折射出的办学理念。

1. 以日为师的外部结构模仿：以课程设置为例

京师大学堂共设八大学科门类，称分科大学。我们以政法科大学为例来分析中国在具体办学形式上的效仿。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政法科设法律与政治两学科，各学科教授的科目均有必修和选修两类。京师大学堂政法科分法律门和政治门两门，与日本东京大学的专业设置相同。不同之处在于规定各科目均为必修，选修科目则为其他分科大学所开设的课程。

京师大学堂政治学门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政治学科课程之比较

京师大学堂	日本帝国大学
政治总义	政治学
大清会典要义	国法学
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	宪法
东西各国法制比较	比较法制史
全国人民财用学	经济学
国家财政学	财政学
各国理财史	经济史
各国理财学术史	经济学史
全国土地民物统计学	统计学
各国行政机关学	行政法学
警察监狱学	民法
教育学	国际私法
交涉学	国际公法
各国近世外交史	外交史
各国海陆军政学	法制史
各国政治史	政治史
法律原理学	法理学
各国宪法民法商法刑法	商法
各国刑法总论	刑法总论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上述课程，尽管从字面看有所不同，但基本相互对应，且课程数量也一致，显然是以日本大学课程设置为模本而规划的。京师大学堂政法科政治学门的课程表中有教育学一门，至于为何要设置该科目，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以日本大学的课程设置为蓝本的做法，也体现在其他分科大学中。

表面上看，京师大学堂是一种新型学制，其体制结构是在直接学习日本大学的基础上建构的。但实际上它对日本大学教育体系的模仿，只是着眼于组织架构、专业分类、课程设置等外部框架。从内部结构分析，依然深受传统理念影响，“中体西用”的思想仍旧是其办学宗旨和根本所在。1902 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与 1904 年的《大学堂章程》均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其办学宗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这是制订章程者所奉行的办学原则[1]，也是其办学思想的具体阐释。这种强调培养人才以忠君尊孔为本位的取向体现了浓厚的封建性。因此，尽管京师大学堂在办学模式、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方面处处仿效日本，但骨子里依然以中学为体。

2. 理念内涵：浓厚的封建性

(1)尊经学为立国之本。

张百熙负责制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以日本大学分科设置体系为蓝本，将大学分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尽管使用了格致、政、农、工、商等传统术语为各专业命名，但专业基本一致，只是将处于日本高等学校层面的商业科也列为京师大学堂的学科，这反映了张百熙本人对实学的重视。而且最重要的是经学没有被单独设为一科，而是作为课程科目放置到文学科中。这种没有将经学提升为专门学科的做法，受到朝野的众多反对。

1902 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分科方案[2]

学　科	科　目
政治科	政治学 法律学
文学科	经学 史学 理学 诸子学 掌故学 词章学 外国语言文字学
格致科	天文学 地质学 高等算学 化学 物理学 动植物学
农学科	农艺学 农业化学 林学 兽医学
工艺科	土木工学 机器工学 造船学 造兵器学 电气工学 建筑学 应用化学 采矿冶金学
商务科	簿记学 产业制造学 商业语言学 商法学 商业史学 商业地理学
医术科	医学 药学

经学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理论依据，也是封建专制社会结构得以维持的重要基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提出，反映了既得利益群体对社会结构维护所做的努力，同时也是价值取向的争夺。“体”的核心就是中国“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体系，这种价值观是不容否定的。中体西用即是让读书人群体在原有的价值取向上学习一些西方技术，但作为本位的经学依然是教育的核心。张百熙虽然认为伦理道德教育仍占有重要地位，如其所言：“中国圣经垂训，以伦常道德为先。今无论京外大小学堂，于修身伦理一门视他学科更宜注意，为培植人才之始基。”[3]但他却没有将经学单独列为一学科。这种做法当然得不到清廷的支持，同时也招致了政府对他的猜疑，当然还有其他诸种缘由。因此，该章程虽经制定，但并没有实施。相隔不到一年，又出台了《奏定大学堂章程》，成为日后正式指引京师大学堂办学的指导性文件。

1904 年《奏定大学堂章程》分科方案[4]

学　科	科　目
经学科	周易学 尚书学 毛诗学 春秋左传学 春秋三传学 周礼学 仪礼学 礼记学 论语学 孟子学 理学
政法科	政治学 法律学
文学科	中国史学 万国史学 中外地理学 中国文学 英国文学 法国文学 德国文学 俄国文学 日本国文学
医科	医学 药学
格致科	算学 星学 物理学 化学 动植物学 地质学
农科	农学 农艺化学 林学 兽医学
工科	土木工学 机器工学 造船学 造兵器学 电气学 建筑学 应用化学 火药学 采矿及冶金学
商科	银行及保险学 贸易及贩运学 关税学

《奏定大学堂章程》的最大特色在于突出经学的地位，将其从文学科中分离出来，且位列众学科之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首。经学的各门均需专门研究，设置了周易学、尚书学、毛诗学、春秋左传学、春秋三传学、周礼学、仪礼学、礼记学、论语学、孟子学、理学11个门类，大大强化了经学引领各类学术的至尊地位。在张之洞看来，经学是立国之本，“若是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5]。因此，尽力维护经学的传统地位，成为贯穿整个章程的主线。

(2)浓厚的官本位价值取向。

京师大学堂在具体办学模式上师法日本，但在学生入学资格、授以出身、设置学校官员等级等方面无不体现出传统理念的痕迹。《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对学生的入学资格做了规定：“学生分为两项，第一项，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侯选道府州县以上及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之愿入学堂肄业者，第二项，各省中学堂学成领有文凭咨送来京肄业者。”[6]当时的中国依然是私塾等传统教育形式占主流位置，整个社会理念尚未能接受大学、中学、小学三级连贯的西方教育体系。因此，新式中学毕业生实属稀少，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主要就是官宦及士绅子弟。章程还明确规定进士、举人出身的京曹进入大学堂的仕学院学习。由于在当时人们心目中，依然是以国家科第仕进为中心，学子不肯入学校。为鼓励学生前来大学堂求学，又规定给学生学成后授以生员、举人、进士的出身奖励。1902年对此规定又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和细化：学生毕业后，经管学大臣考核，择优带领引见。如原系生员者，准做贡生，原系贡生者，准做举人，原系举人者，准做进士。奖励最优等以编检用，优等以庶吉士用，中等以部属用，下等以知县用。

1903年增设的进士馆，专门针对进士馆学员做了规定：“凡一甲之授职修撰编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其在堂肄业之一甲进士庶吉士，必须领有卒业文凭，始准送翰林院散馆，并将堂课分数于引见排单内注明，以备酌量录用。”[7]即使是凭借正统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的读书人，也要进入京师大学堂镀金，然后才能安排官职。此举从表面上看有助于扩大大学堂的名望，吸引更多的士人进入学堂学习，但事实上进一步强化了读书做官的传统理念和价值取向。人们的思维定势从读书－登科－做官，转为读书－进大学堂－做官。京师大学堂与其说是个大学，不如说是个官僚养成所。

学生的官员或准官员身份让他们进入京师大学堂后，就能领受国家俸禄。《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按照不同的设定等级，学生可以每月拿到从20两到4两不等的膏火费。[8]将学生纳入国家供养体系，让他们具备准官僚身份，依然是传统做法的延续。

京师大学堂教习的官员身份也是章程中明确规定的：总教习一员，略如国子监祭酒、司业之职，每月薪水白银300两；教习，略如翰林院五经博士、国子监助教之职，每月薪水30两、50两不等。至于总办、提调等学堂其他管理人员，均由各部院司员充任，也有相应的官职。总办每月薪水100两，提调每月薪水50两。

尽管京师大学堂甚至连建筑规制、学舍数量也尽量参照日本的现成样式，但其奉行的理念依然是传统的。官本位和权力本位的传统价值观始终指导着学子，以至于京师大学堂有这样一位学生，本来是被聘为教师的，但因为京师大学堂的毕业生可赐予进士出身，授予编修、检讨、庶吉士和主事等官职的奖励，就决然不做教师而做学生。[9]尽管这只是个案，但从中也透露出学子们人人皆思作官的价值取向。以做官为荣，而非求知，充分体现了京师大学堂办学理念的传统性和封建性。

二、近代大学理念的转型：《大学令》的颁布及北京大学实践

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经辛亥革命建立民国，教育部推出《大学令》，十余年间，中国大学教育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效法日本模式向效法德国模式的转型。德国大学理念的主要内涵处处显现在蔡元培主持制订的《大学令》及日后他主长北京大学所施行的改革实践中。

1. 大学的学术本位原则

蔡元培留德期间，曾对德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伦理学家鲍尔生(Friedrich Paulsen，1846－1908)做过深入研究。鲍尔生所著《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是一本关于德国大学的名著，对德国大学的历史发展、当时的组织状况、教学与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概括和介绍，涉及大学发展的各个重要方面，其中包括对德国大学理念的精辟论述。他概括的德国大学学习包括“科学的专业知识、从事独立学术研究的能力、哲学修养。”这正是德国大学理念的核心要素。这一大学理念建立在新人文主义哲学基础上，以关乎人的知识为根本，以人的价值实现为目的，所谓的人既包含大写的人也包含小写的人；既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也追求民族、国家、人类的价值实现。达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到这样的目的，大学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它承继的是中世纪大学知识本身就有其价值的生活态度，因此，价值理性主义成为德国大学理念的特征。学术本位、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是德国经典大学理念的核心。蔡元培还曾在一篇译文中把德国大学的特色概括为"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为一"。[10]

深受德国大学理念影响的蔡元培主持制订《大学令》时，首先明确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以此作为中国大学教育的目标。与京师大学堂奉行的"以忠孝为本，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础同时具有一定西学素养"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教育目的截然不同。1912年5月16日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的演讲中，蔡元培又明确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强调了学术取向的大学发展目标，西方经典大学理念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得到进一步深化。

《大学令》中的学科体系不再以经学为核心与统领，取消了经学科，改《奏定大学堂章程》的经学、政法、文学、医、格致、农、工、商八学科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从表面上考虑，将经学科并入文科，是因为《易》、《论语》、《孟子》的教学已进入哲学系；《诗》、《尔雅》的教学列为文学系的内容；《尚书》、《大戴记》、《春秋》三传、三礼归为史学系的教学任务。因此，这些内容已无独立存在的必要。但从更深层次的因素考察，将独立设置的经学科从体制建构的层面予以消除，不仅宣告了晚清忠君尊孔教育宗旨的消亡，更是试图将维护中国两千年封建结构与传统价值观的理论基础进行根除。这些改革标志着近代中国大学在学科建设上，开始摆脱传统经学的束缚，奠定了近代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的基本框架，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迈进。

教育部还制订了《专门学校令》，就大学与高等专门学校做了分类，设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外国语等专门学校，这类院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不同于大学用高深学术培养硕学闳才的目标，这与德国高等教育的分类办学模式十分相象。德国高等教育分专门学校和大学两种，前者注重各种应用之学，造就各类专门技术人才，而大学的任务在于专门之研究与科学之陶冶。蔡元培对此有精到分析："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高等专门学校'。"[11]因为"专门学校是造成人才，应社会之需要；大学则以研究高深学术满足智识欲为目的"。[12]两类学校的分而立学，体现了学与术分离的德国大学办学理念。

蔡元培认为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二科。因此在学科设置上，《大学令》重视文理两科，规定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因为"学与术虽然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文、理学也，虽也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目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经验，促进术之进步。"[13]因此，根本之所在还是纯粹学理的研究。"中国固然要有好的技师、医生等，必须有熟练技能而又深通学理的人。……要是但知练习技术，不去研究学术；或一国中，练习技术的人虽多，研究科学的人很少，那技术也是无源之水，不能会通改进，发展终属有限。"[14]所以，"在大学，则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之师，而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目的。"[15]这和洪堡提出的"所谓高等学术机构，无非是具有闲暇或有志于学术和研究之辈的精神生活"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但《大学令》偏重文理两科设置的规定在具体实践中并未得到实施。如果说官本位在中国处于主导地位的话，而在当时北大则是变本加厉。"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16]据统计，1917年北大法科本预科在校生为841人，文科为418人，理科为422人，工科只有80人，读法科的为读文理两科的总数，读工科的10倍半。这正是中国官本位社会理念的反映。学生读书志不在求学，而在于猎取功名利禄，因此，时人称北大为"官僚养成所"。

尽管民国成立后，蔡元培主长教育部时，看到北大积弊甚多，曾着手进行过改革，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大学堂总督改称大学校校长、总理校务，分科大学监督改称分科大学学长、分掌校务。经、文科合并，改为文科，并推荐严复担任北大校长。但严复因与教育部发生冲突，仅任职数月就辞职。

至1916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前的5年时间里，校长更换了4任。只有第四任校长胡仁源的任期相对较长，对北大的影响较大。他在1914年初至1916年底主长北大的三年时间中，针对北大的积习，于1914年9月，拟订了整顿大学计划书，对本科和预科分别进行整顿充实。主要改革事项有二：一是延聘一批著名的学问大家，使北大学风从崇尚宋儒空谈理性转为注重考据训诂。二是成立首届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评议会，可惜未能持续。严复、胡仁源的努力只能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将京师大学堂的办学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校风。

蔡元培接手北大后，目标就是按照现代大学的标准，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立北大理念，让北大人完成从官本位到知本位的转变。这是北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他对读书做官的传统理念进行了颠覆，树立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的信念，而非升官发财之门梯。其次，在他看来，人的因素是占第一位的。“延聘纯粹之学问家”和“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成为改革的重点。所谓“纯粹之学问家”即是以知识为本位的学者。在中国古典读书人的理念中，知识是作为达到目的的工具而非目的本身存在的。虽然为求知而求知的知识分子不是没有，但只是以个体形式而存在，并未能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而这个阶层的存在恰恰是现代大学形成的必要条件。熟悉西方大学发展史的蔡元培深知能否聚集这一人群，是北大成功的关键。为此，他明确指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17]，并着手广聘各类人才，使其聚集在北大的学术特区中，让北大的学术气象和学风焕然一新。

2. **大学的自由、自治原则**

在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原则下，教授有教的自由，学生有学的自由。但学术自由是为了创造新知识。“教师不是为学生而设，两者都是为学术而共处。”[18]师生的共同目标是致力于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取得新颖的知识。因此，“大学不再以博览群经和熟读百家为能事，却要求学生掌握科学原理、提高思考能力和从事创见性的科学研究。”[19]奉行该理念的大学，“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20]德国大学以对学术的追求为己任，但并不排斥对国家、社会的服务，因为两者目标一致，他们相信“只要大学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它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政府的目标。”[21]该理念与《大学令》中“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德国大学校长和各学院院长，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们从他们中间选出。教授们公选出的校长和各学院院长独立负责大学或学院的学术事务，这成为德国大学理念不可动摇的核心原则之一。对这种管理制度蔡元培很是推崇。

《大学令》规定由各学科学长及教授组成的评议会为学校最高评议机构，总辖大学事务的校长为评议会议长，并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评议会的权力包括审议各学科的设置及废止；讲座之种类；大学内部规则；审查学生成绩及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等。评议会如有意见，可直接建议于教育总长。评议会下设各科教授会，各科学长为议长。教授会的职责是：审议学科课程；学生实验事项；审查学生属于该科之成绩；审查提出论文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并负责教育总长和校长咨询事件。这种教授治校的机构建制主要模仿德国大学的管理模式。

《大学令》包含了蔡元培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思路和主张，各项措施均意在凸显大学的主体地位和独立性质。但因为处于一个政局动荡的非常时期，这一系列教育法规制订颁布后，即因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蔡元培愤而辞去仅任职半年的教育部长职务之故而未能得到切实贯彻。此后，教育部长变动频繁，在民国初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后五易其人，当时许多政令都是出不了京门的，因此，法规的建构只能是流于一纸空文。当时的大学基本未能实行《大学令》的种种规定。这些具体措施的实行只到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才在北大一一得以给予制度和实际的双重建立。

蔡元培认为从前的北大，一切校务都由校长和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各科学长也无权与闻其事。这既不利于学校的发展，也不符合德国经典大学理念的自由、自治原则，遂推行评议会、教授会和行政会三会合一的教授治校模式。上述三会组成主持全校事务的机构，皆由北大全体教授们通过公开投票选举出来的各科教授组成。在蔡元培领导下，学有专长的教授们除了教学工作外，有多人在上述三类机构中兼任数职，成为教授治校模式的具体演绎。

蔡元培在北大推行大学自治原则，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师群体，让真正懂得学术的学者来管理。这种改革，一扫以往大学的官僚作风。他积极捍卫教授治校所体现的学术自由与自治原则。当时北大规定学生入学要交一份由现任京官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有个叫马元材的学生反对这种规定，给蔡元培写信说：“我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不料还未入学，就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京官面前去磕头求情，未免令人大失所望，我坚决表示，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我就决定退学。”不久，蔡元培亲自写信答复说：“查法国各大学，本无保证书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变制度，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在未决定前，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证的话，就请到校长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我签名盖章。"[22]尽管他是一校之长，但一旦教授会讨论通过的相关制度，他总是带头遵守，决不以自己的职位和权势来搞特权。蔡元培全力建立的这种保障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机制，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知识分子主体意识，同时从制度上保证大学运转的自主性和连续性，北大由此开始了其生气勃勃的发展进程。

蔡元培在治校过程中，发现年级制的弊端，"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数种课程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兴味毫无，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阅他书及时时旷课。"[23]为改变此种流弊，让学生随学术兴趣自由发展，对有特长者，不强屈之以普通教育，有天才者尤当利用之以为先导。恰逢胡适的推荐，美国大学实行的选科制遂被引入北大。[24]

德国大学最有特色的集教学与研究于一体的习明纳制（即高年级学生在专家的指导下，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养成独立从事研究的能力）在此时期引入北大，以研究所的形式出现。1917年学校决定建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其中文科下设国文学、英文学、哲学三个研究所，理科有数学、物理学、化学研究所，法科有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研究所，并由各研究所合力出版《北京大学月刊》，作为师生自由讨论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1920年经评议会议决，将上述9个研究所命名为国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自然科学研究所，各研究所成为师生共同进行自由研究的场所。

蔡元培按照他的理想，将一批醉心学问的学者聚拢在北大，依托他们的教学、人格，让学生领略了何为学术、何为大学。正如冯友兰回忆的，"蔡先生在为文科换了新学长之后，又陆续聘请了全国在学术上有贡献的知名学者，到北大开课，担任教师。学生们觉得学校的学术空气日新月异，也逐渐认识到大学是研究和传授学术的地方。在大学中唯一的价值标准是学术。谁在学术上有贡献，谁就受到尊敬。混资格准备做官的思想逐渐没有了，新的学风树立起来了。"[25]

从《大学堂章程》到《大学令》，从以日为师到以德国为师，近代中国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大学理念及具体办学层面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蔡元培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大学理念的现代转型尽管起点高，但时间短暂，此后的演进一直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时时受到传统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及官本位理念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言，大学理念的现代转型一直延续到当下。

时代呼唤着大学培养出更多的创新人才，而创新型大学建设中，汲取德国经典大学理念的精华仍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在当今急功近利的喧闹中。理念是发展的，其内涵也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丰富。从德国经典大学理念发展到美国现代大学理念，大学的职能从教学、科研扩展到社会服务，我们发现，学术的价值取向与工具取向的两相结合、两相制衡构成了现代大学的精神实质与理念内涵，也成为当下中国大学改革的目标。

参考文献：

[1][3][5] 璩鑫圭.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C].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289，235，492.

[2][4][6][7][8]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88，129-130，83，153，86.

[9] 陈军. 北大之父蔡元培[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6-27.

[10] 巴留岑. 德意志大学之特色[J]. 教育杂志，1910，(11).

[11][13][15][16][17][23] 高平叔. 蔡元培全集（第3卷）[C]. 北京：中华书局，1984. 150，149-150，150，5，211，332.

[12][14] 高平叔. 蔡元培全集（第4卷）[C]. 北京：中华书局，1984. 262，42.

[18][21] 陈洪捷. 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修订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98，200.

[19][20] 鲍尔生. 德国教育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125，126.

[22] 马元材，非百. 曦园回忆录之三[N]. 团结报，1982-10-30.

[24] 胡适文集[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12；高平叔. 蔡元培全集（第3卷）[C]. 北京：中华书局，1984. 332.

[25] 钱理群. 走近北大[C].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14-15.

（本文责任编辑　邓建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